

《红楼梦》东观阁本再考

陈 力

十年前,笔者曾撰《〈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①,对《红楼梦》东观阁本作了初步的探讨。斯时僻处蜀中,所见甚寡,对有些问题尚存疑惑。去岁卜居日下,得窥天禄,更蒙友朋之助,稍益见闻,因不揣浅陋,再考如次。

一、东观阁与东观阁主人

《红楼梦》原以抄本行世,到乾隆末年,才有了排印本和刻印本。所谓排印本,即世人熟知的“程甲本”与“程乙本”^②,学术界对此二本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但对于《红楼梦》早期刻本的研究,则非常有限。应该说,《红楼梦》排印本的出现,是《红楼梦》走向大众的第一步,但由于排印本的印数有限,真正使《红楼梦》普及化的还是刻印本。因此,《红楼梦》早期刻本的情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早提到《红楼梦》刻印本的,据现在已有的材料,应该是周春。他在《阅红楼梦随笔》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闱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若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胡适之先生据此对东观阁的情况提出了推测,他在给苏雪林、高阳的信中说,程甲本“一到了南方,就被苏州书坊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的冬天雕刻翻印”。他这里所说的苏州书坊,就是指的东观阁^③,伊藤漱平先生也曾将周春所提吴门开雕的《红楼梦》与日本江户时代的《村上文书》中所载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日(1793年11月23日)“王开泰”寅2号船载《红楼梦》九部十八套由浙江乍浦港出发,十一月初六日(12月9日)抵达日本长崎港之事联系进来,认为这就是东观阁最早的刻本,其刻书的地点在苏州。赵冈先生则提出东观阁在北京^④,但并无确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伊藤漱平先生发现了新的线索,也修正了他过去的看法。他在《〈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补说》一文^⑤中引用法式善《梧门诗话》的一段话,指出东观阁在北京琉璃厂,其主人为王德化(字珠峰,江西人),其说可从。

二、东观阁之初刻本、重刻本与覆刻本

东观阁初刻《红楼梦》究在何时,现在并不清楚,一般认为应该在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至于胡适之先生将乾隆五十七年苏州书坊翻刻《红楼梦》与东观阁刻《红楼梦》混为一事,并无实据,且东观阁非苏州书坊之证据,已见上文,因此东观阁本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之说难以成立。

《红楼梦》东观阁之初刻本题名《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无注,半叶十行二十二字,白口,书口下镌“东观阁”。前有东观主人识语,云: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釐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亥豕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东观主人识。

东观阁初刻本系据程甲本重刻，但在文字上与程甲本颇有异同。一方面是由于程甲本本身有明显的排字错误，另一方面也是东观阁初刻本曾据他本如程乙本进行了校勘，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一文中进行过分析，不赘^⑥。

东观阁初刻本为白文本，到了嘉庆十六年，东观阁又刻了一版，这就是所谓嘉庆十六年本。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封面题：“嘉庆辛未重镌，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也是半叶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开本较初刻本稍小，卷首的插图也与初刻本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初刻本的插图边框为直角，而嘉庆十六年本为波纹曲角。

东观阁嘉庆十六年之重刻本在红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正文行间加批注及圈点，这是今天已知《红楼梦》的第一个有注的刻本。同时，东观阁初刻本和嘉庆十六年批注本问世后，衍生出了不少的覆刻本和重刻本，对于《红楼梦》的传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粟先生在《红楼梦书录》中著录有《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其封面题“嘉庆辛未（十六年）重镌，文畲堂藏板，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其中也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一粟先生称此本为嘉庆十六年东观阁重刊本^⑦。窃意东观阁嘉庆十六年重刻本与文畲堂本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这里有三种可能：一、文畲堂本乃文畲堂借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所刻书板刷印者；二、文畲堂本乃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转板后由文畲堂刷者；三、文畲堂覆刻或重刻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如同治元年宝文堂覆刻嘉庆东观阁本题“东观阁梓行，宝文堂藏板”。因未见文畲堂本原书，姑妄言之^⑧。

在东观阁本中，还有嘉庆十九年本。此本笔者曾在《〈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一文中作了初步的介绍。笔者所见为四川大学图书馆和杜春耕先生所藏，小字巾箱本，共一百二十回，首有绣像二十四幅，封面题“嘉庆甲戌重镌绣像红楼梦”，次高鹗叙，次目录，次绣像，白口，半叶十行二十二字，亦即日本学者伊藤漱平所谓嘉庆十

九年本者。伊藤氏未指明此即东观阁之重刻本，盖因其并无东观阁刻之明显证据。

东观阁嘉庆十九年本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以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与之比勘，它的一部分是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但铲去了行间批、重点、重圈者，这部分版式及字体笔画等都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无异，只是行间批等被铲去，其上下边框尚遗斑斑铲痕，但仍有少量行间批及重点、重圈漏铲而被保留了下来。除此之外，这部分在刷印前还做了一些校勘的工作，例如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六回第二页B第七行：

因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

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冷”字之“冫”大概在刻板时被误铲去而作“令”，而杜春耕先生藏嘉庆十九年本已改为“冷”，并且此字略向右下方倾斜，显系剜改；又，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六回第三页A第九行：

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教尔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按程甲本、程乙本、东观阁初刻本“教尔”均做“做官”，杜春耕先生藏嘉庆十九年本改作：

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做官”二字略向右下方倾斜，亦显系剜改，其他的字体等与东观阁十六年刻本完全相同（但铲去了行间批和重点、重圈）。

嘉庆十九年本的另一部分则是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覆刻，但基本上没有行间批、重点和重圈。这部分字体笔画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大致相同，但细细审之，仍可判定它们并非如前述据嘉庆十六年本铲去行间批、重点、重圈而刷印者。例如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一回第四页B：

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阖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阖外有个十里街……

十九年本“阖”则作“门”；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一回第五页A：

枕书伏几盹睡。

嘉庆十九年本则将“几”误作“凡”；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七十九回第三页B：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
“绍祖”二字作合文。而嘉庆十九年本则作：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且]一面的
“绍祖”二字虽仍作合文，且字体亦与嘉庆十六年本极为相似，但
“祖”误作“且”。这些都显系覆刻之误。

笔者曾经在《〈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一文中推测：“到嘉庆十九年前后，北京琉璃厂的东观阁大概已经歇业或者由于其他缘故，其嘉庆十六年所刻之书版转归他人，这批书版的新主人将残缺的书板修补重刻并剜去原有的重点、重圈、行间评等后重新刷印，所以封面不记刻书处，并抽去了东观阁主人的识语，此即川大本和伊藤所见本。”^⑨最近见到的杜春耕先生藏嘉庆十九年与川大藏本一样，封面也没有刻书处。根据上面的讨论，看来当初的推测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书版仍属东观阁的话，东观阁主人似乎没有必要铲去原来的批注，同时又另行覆刻部分书版补配。综上所考，嘉庆十九年本乃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之剜改并补配者。

还有一些本子，虽题名为东观阁梓行，但并不一定就是东观阁所刻，而有可能为其他书坊据东观阁本重刻，如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道光二年刻本、道光十年储英堂刻本和同治元年宝文堂刻本等。

嘉庆二十三年、道光二年刻本，此二本版式相同，正文及注文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相同，但行款、开本则与嘉庆十六年刻本不同，为半叶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开本较十六年本宽。一粟先生将嘉庆二十三年本列在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下，意其亦出于东观阁。^⑩王三庆先生也认为，此本系东观阁据嘉庆十六年本重刊，即东观阁的第三版^⑪。管见以为，嘉庆二十三年本虽题“嘉庆戊寅重

镌,东观阁梓行”,但恐非东观阁所刻,而可能是其他书铺据东观阁重刻。理由如下:此本有重点、重圈、行间批,与东观阁十六年刻本相同,但行款却完全不同,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写样、刻板,工程较大,如果不是板片完全漫漶不能继续刷印或者内容有重大变动,一般书商是不会重新刻板的。即或是要重新刻板,也可据上一版直接覆刻,如此可免写样与校对之劳。至于道光二年本,虽然行款与嘉庆二十三年本相同,字体也极为相近,但细审其版式和字体笔画,二者并非同一版刷印,道光二年本显然是据嘉庆二十三年刻本覆刻。

关于储英堂本,笔者所见为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扉页题:“道光庚寅重镌,东观阁梓行,储英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附东观阁主人识语,行款及行间批、重点、重圈等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同,字体风格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相似,但将二本进行对比,储英堂本显然是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覆刻,第六回第三页A第九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教尔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储英堂本“做官”二字亦误作“教尔”,但将部分重圈改成了长点。

据嘉庆十六年本覆刻并且流传很广的还有同治元年宝文堂刻本。宝文堂本封面题:“同治壬戌重镌,东观阁梓行,宝文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后附东观阁主人识语及程伟元序。宝文堂本行款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相同,也是半叶十行二十二字,除部分重圈改作重点外,其余如行间批、字体风格等与嘉庆十六年本相同,细审其版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实际上是据东观阁十六年刻本覆刻^⑫,但插图与东观阁本完全不同,而与道光十二年双清仙馆刻王希廉评本相同。宝文堂本虽系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覆刻,但较底本也有一些改动,除了一些错字外,宝文堂本覆刻时也将大部分重圈改成了长点,这一点与储英堂本相同。笔者比较了储英堂本与宝文堂本,似乎宝文堂本字形更接近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可以大致认定宝文堂本非据储英堂本覆刻,而是直接据东观阁嘉庆十六

年本覆刻。

据一粟先生《红楼梦书录》，善因楼本也出自东观阁本。善因楼本也是半叶十行二十二字，有重点、重圈及行间批，第九至十四回书口下更有东观阁字样^⑯，曹立波博士有较详细的介绍^⑰，善因楼本乃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覆刻^⑱，并且，善因楼本似乎并不止一个刻本，至少有扉页题“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东观阁梓行”与题“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善因楼梓行”两种。

还有一些本子虽然没有署明系据东观阁本重刻和覆刻，但仍同东观阁刻本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让堂本是程甲本系统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本子。三让堂本扉页题“新增批点红楼梦，三让堂藏板”，半叶十一行二十七或二十八字，白口，书口下或镌“三让堂”，插图与东观阁本完全不同。就其内容来看，系据东观阁本嘉庆十六年本重刻。关于这一点，各家均无异说。三让堂本有重点、重圈和行间批，这是最受人注目的地方。王三庆先生云：“（三让堂本）从圈点形式而言，属于东观阁本系统，而把高序省略，目录移在图赞之后，又绣像十五页正文每面十一行，似受纂本的影响。然而采取每行二十至二十八字更袖珍的板式，加上评语作号召是这一系列刊本的特色。”^⑲韩进廉先生亦云：道光间刻印的三让堂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其特点是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⑳，魏绍昌先生更明确地提出：“程甲本、程乙本都是删去脂批的白文本，自三让堂本起，才又加批语。”^㉑《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也说三让堂本是程本系统的第一批点本^㉒。而台湾学者徐仁存、徐有为则认为东观阁嘉庆二十三年重刻本最先有评点^㉓。以上这几种说法都不确切，如前所述，《红楼梦》刻本系统中，最早有批评的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东观阁刻本。笔者核对了三让堂本的重点、重圈和行间批，基本上就是据东观阁十六年本重刻。当然，三让堂本与东观阁本也有一些不同，如行款、插图都与东观阁本不同，文字上也作了少量的校勘。至于徐仁存、徐有为先生大概

没有看到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因而误将嘉庆二十三年重刻东观阁本当作了最早的批点本。

关于三让堂本的刻印时间，据王三庆先生研究，三让堂刊刻的年代“上限大概在嘉庆廿三年（1818），下限则到同治初年”。与三让堂同属一个系统的有经纶堂本、文元堂本、忠信堂本、同文堂本、纬文堂本、右文堂本、三元堂本、务本堂本、经元升记本、登秀堂本、佛山连元阁本、翰选楼本、五云楼本等，它们有些是借三让堂本书板刷印，有些是三让堂本转板后的印本，有些有补刻，有些则是重刻。^②

籐花榭本也是红楼梦众多刻本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子，它与东观阁本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籐花榭本封面题：“绣像红楼梦，籐花榭藏板”，无注，半叶十一行二十四字。关于籐花榭本的刊刻时间，清道光三年曹耀宗《红楼梦百咏词跋》云：“予昔游金陵，适籐花榭板初刊，偶携一册，杂置书丛，今越五载，长夏无事，检取评点之。”嘉庆二十四年，籐花榭还刊行了归锄子撰《红楼梦补》，一粟及王三庆先生据此断定《红楼梦》籐花榭本当刊行于嘉庆二十三年左右。^③杜春耕先生藏有一部籐花榭本，封面题：“嘉庆庚辰镌，绣像红楼梦，籐花榭藏板”，按嘉庆庚辰为嘉庆二十五年，但此本版面模糊，显系後印，未知封面所题是否为後來补刻。不过，据此可以确定籐花榭本的刊刻时代必在嘉庆二十五年或其前。关于籐花榭本的底本，一粟先生并未明确指出，韩进廉、魏绍昌先生均谓据程甲本翻刻^④。王三庆先生谓“此本如非直以程本覆刻，即据东观阁原刊本翻刻，并以程甲本订正”^⑤。韩、魏、王诸先生之说都有些问题，我们不妨对此稍作分析。

籐花榭本的插图与三让堂本基本相同，而三让堂本的文字内容与东观阁十六年刻本基本相同，据此看来，籐花榭本应该与东观阁十六年本有着某种联系。更重要的是，籐花榭本的文字本身也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有些关系，甚至错字亦沿袭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之误，如第十三回第九页A第一行，程甲本作：

王夫人道:心哥既这么说
程乙本作:

王夫人道:你大哥既这么说
《红楼梦》的另一个早期刻本——“本衙藏板”本作:

王夫人道:珍哥既这么说
东观阁初刻本作:

王夫人道:珍哥既这么说
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则作:

王夫人这:珍哥既这么说
“王夫人这”显系“王夫人道”之误,而簾花榭本文字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道”亦误作“这”。簾花榭本与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同误,大概不是出于巧合,因此这样的例子并非个别,如:第七十六回第11页B第10行,程甲本作:

小娘忙去开门看时,却紫鹃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

“本衙藏板”本、东观阁初刻本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找他”却误作“我他”,簾花榭本文字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找”字亦误作“我”字。在我们下面所列的程甲本、程乙本、“本衙藏板”本、东观阁初刻本、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异文对照表中,除一条簾花榭本与诸本文字都不同外,其余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因此,簾花榭本之底本应当是东观阁十六年刻本,而非如王三庆先生所言为东观阁之初刻本,也非程甲本。

据簾花榭重刻的有同治三年耘香阁刻本、济南会锦堂、济南聚和堂、凝翠草堂本等。

三、东观阁本与程甲系之早期刻本

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根据程甲本重刻的白文本不只一两种,现在所知者,除东观阁初刻本外,还有抱青阁本、题“本衙藏板”者

(以下称“本衙藏板”本)和《绣像红楼梦全传》。

抱青阁本见一粟先生《红楼梦书录》,“一百二十卷。扉页题:‘嘉庆己未年镌,绣像红楼梦,抱青阁梓’。首程伟元序,高鹗序,次目录,次绣像二十四页,前图后赞。正文每面十行,行二十四字。无题记,余同本衙藏版本。”关于抱青阁本的具体情况,以及与程甲本、东观阁本的关系等,因未见原书,不敢妄言。

“本衙藏板”本封面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本衙藏板”,其插图全仿程甲本,版框与程甲本相同,作波纹曲角,而与东观阁初刻本作直角完全不同。其中“秦氏”一幅插图壁上有“海棠春睡图”及“嫩寒锁梦因春冷”字样,与程甲本同而与东观阁初刻本(无字)不同。“本衙藏板”本行款也与程甲本同,半叶十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与大多数红楼梦刻本不同的是,“本衙藏板”本回首、书口或作“红楼梦第×”、“卷第×”。其识语云:

红楼梦一书,向来只有抄本,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辑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摆成,勘对较难,书中颠倒错落,几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则所行不广,爰细加釐定,订讹正舛,寿诸梨枣,庶几公诸海内,且无鲁鱼豕亥之误,亦阅者之快事也。

此识语内容与东观主人识语基本相同,版式亦同,但无“东观主人识”字样,王三庆先生根据《后红楼梦》、《红楼复梦》、《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等都署有“本衙藏板”,因而推论:“足以证明‘本衙藏板’一系列刊物,都是在嘉庆初年到道光四年间,专门从事《红楼梦》、《金瓶梅》等说部的生意,可能在翻刻后赚到了钱,于是再有‘后梦’、‘复梦’、‘补梦’、‘增补梦’等的翻刻。”由于嘉庆十六年东观阁带评本的出现,夺走了《红楼梦》的市场,因此这家书坊就歇业了,故“可以断定‘本衙藏板本’应是直接翻刻东观阁本的第一个本子,而其下限不得晚于嘉庆十六年东观阁带评本的出现”^②。至于为什么是“本衙藏板”本翻刻东观阁本,而不是东观阁本翻刻“本衙

藏板”本,或二者之间并无翻刻与被翻刻的关系,王三庆先生并未深究,也没有从二者的文字内容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比较,因此只是一个猜想而已。特别是他将署“本衙藏板”的书简单地都视为同一书坊所刻,更是靠不住的。魏绍昌先生谓“本衙藏板”本乃据抱青阁嘉庆四年刻本翻刻^②,但未知何据。

要厘清“本衙藏板”本与东观阁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版本来源,需要作更细致的分析。笔者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本衙藏板”本与程甲本、程乙本、东观阁初刻本以及嘉庆十六年刻本略作比勘,从诸本文字之异同上似可寻出一些端倪:

程甲本、程乙本、“本衙藏板”、东观阁初刻本、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异文对照表

回(V)、页(A面)、(B面)、行(L)	程甲	程乙	本衙藏板	东观阁初刻本	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
1V1A5L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子女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子女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5V12B4L	一味的骄奢淫荡贪還搆	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	一味的骄奢淫荡贪還搆	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	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
13V9A1L	王夫人道:心哥既这么说	王夫人道:你大哥既这么说	王夫人道:珍哥既这么说	王夫人道:珍哥既这么说	王夫人这:珍哥既这么说
17V10A2L	麝芜满院斜泣阳	麝芜满院斜泣阳	麝芜满院泣斜阳(注:“斜阳”二字似为后来剜改。)	麝芜满院泣斜阳	麝無满院泣斜阳

65V11B4L	说句顽话，就嚇得这个儿。	说句顽话儿，就嚇的这个样儿。	说句顽话，就嚇得这个儿。	说句顽话，就嚇得这个儿。	说句顽话儿，就嚇得这个儿。
69V5B4L	在园中厨内另做了荡水与他吃	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给他吃	在园中厨内另做了荡水与他吃	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	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
70V2B8L	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才冷清呢。	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才冷清呢。	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才冷清呢。	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才更冷清呢。	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才更冷清呢。
70V5B1L	说六月准遥京等语	说六月准进京等语	说六月准进京等语	说六月准进京等语	说六月准还京等语
72V11B1L	把这些出过力的老人家，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	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	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	把这些出过力的老人家，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	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
73V11A4L	没有砍两颗的头理	没有砍两颗头的理	没有砍两颗头的理	没有砍两颗头的理	没有砍两颗头的理
73V11B6L	只该在外头伺候	该在外头伺候	只该在外头伺候	只该在外头伺候	只该在外头伺候
75V3A9L	探春和他畏事，不肯多言	探春知他怕事，不肯多言	探春和他畏事，不肯多言	探春和他畏事，不肯多言	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

76V6B5L	只坐笛韵悠扬起来	只听笛韵悠扬起来	只听笛韵悠扬起来	只听笛韵悠扬起来	只听笛韵悠扬起来
76V11B10L	小娘忙去开门看时，却紫鹃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	小丫鬟忙开门看时，却是紫鹃翠缕和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	小娘忙去开门看时，却紫鹃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	小娘忙去开门看时，却紫鹃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	小娘忙去开门看时，却紫鹃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我他姊妹两个
77V19A1L	二人跟了藏地菴圆信，各自出家去了	二人跟了地藏菴圆信，各自出家去了	二人跟了藏地菴圆信，各自出家去了	二人跟了地藏菴圆信，各自出家去了	二人跟了地藏菴圆信，各自出家去了
78V6B10L	不但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不但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不但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不但一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不但一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
79V3A9L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祖一面的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且]一面的
79V9A3L	问香菱家卿父母	问香菱家乡父母	问香菱家乡父母	问香菱家卿父母	问香菱家乡父母
82V10B4L	只得拉着宝玉哭道	只得拉着宝玉哭道	只得拉着宝玉哭道	只得拉着宝玉哭道	只得拉着宝玉哭道
83V2B10L	人走的脚步步声	人走的脚步步声	人走的脚步响声	人走的脚步步声	人走的脚步步声

84V2B3L	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 样儿也还整 整、……我 看着横竖比 环儿好略些	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 样儿也还齐 整、……我 看着横竖比 环儿略好些	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 样儿也还端 正、……我 看着横竖比 环儿略好些	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 样儿也还齐 整、……我 看着横竖比 环儿略好些	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 样儿也还齐 整、……我 看看横竖比 环儿略好些
85V2B9L	说着呈上谢 宴并请午安 的子来	说着呈上谢 宴并请午安 片子来	说着呈上谢 宴并请午安 的子来	说着呈上谢 宴并请午安 帖子来	说着呈上谢 宴并请午安 帖子来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上表：首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程甲本有误者，“本衙藏板”本多仍袭其误，而东观阁本已多有改正。如果“本衙藏板”本系据东观阁初刻本重刻，就不会出现表中所列那么多东观阁本已经改正的明显错误，据此可以判断“本衙藏板”本绝非据东观阁本重刻，而是直接据程甲本重刻。

其次，“本衙藏板”本虽较东观阁初刻本更接近于程甲本，但并不意味着东观阁本乃据“本衙藏板”本重刻，表中有两例可以证明：

79V9A3L：程甲本：

问香菱家卿父母

“卿”显然乃“乡”之误，因此程乙本、“本衙藏板”本皆改作：

问香菱家乡父母

而东观阁初刻本仍袭程甲之误，作“问香菱家卿父母”，只是嘉庆十六年刻本才改正为“问香菱家乡父母”，由此可知东观阁初刻本并非据“本衙藏板”本重刻。

83V2B10L：程甲、乙本：

人走的脚步步声

“脚步步声”显然有误，因此“本衙藏板”本校改为：

人走的脚步响声

倘若东观阁本乃据“本衙藏板”本重刻，自当据后者校改，但东观阁初刻本、十六年本皆仍程甲、乙本之误，作“人走的脚步步声”，据此知东观阁本非据“本衙藏板”本重刻。

我们认为，“本衙藏板”与东观阁初刻本的母本都是程甲本，二本并无因袭的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衙藏板”本扉页之识语、版式、字体风格与东观阁初刻本之东观阁主人识语完全一样，只是版框较东观阁初刻本稍高（宽度完全一样），“本衙藏板”本识语之字迹刀法流畅，而东观阁本刀法涩滞，很可能是仿刻“本衙藏板”本，这种现象在古代的刻书中是很常见的，若此说不误的话，这大概可作“本衙藏板”本早于东观阁本之一证。

关于《绣像红楼梦全传》本，最早由伊藤漱平先生著录，此本刊行时间不详，扉页题“绣像红楼梦全传”，回首及中缝均题“红楼梦”。首高鹗序、程伟元序，次目录，次绣像二十四页，前图后赞，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卷首和书口标“卷”而不标“回”，目录同程甲。据伊藤漱平先生介绍，此本“刻字比东观阁本精细，从时间上看，推测为乾隆五十八、九年，或嘉庆初年间刊行”，刊刻的地方为苏州，并谓即享和三年（清嘉庆八年）亥拾号船运往日本长崎之《绣像红楼梦全传》二部各四套者^②，王三庆先生谓即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自乍浦出发运往日本长崎的南京商人王开泰的寅貳号船所运《红楼梦》九部十八套者^③。

《绣像红楼梦全传》系据程甲本重刻，因此内容与之相同，如第一回1A程甲本作：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子女，……

程乙本改作：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东观阁初刻本同程乙本。《绣像红楼梦全传》与“本衙藏板”本仍同程甲，“女子”作“子女”。

根据伊藤漱平先生《〈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

补说》一文所附半叶书影,《绣像红楼梦全传》本版式完全与“本衙藏板”本同,卷首题“红楼梦第一”,书口题“卷第一”亦完全与“本衙藏板”本同,字体也极为相似,连卷首题字与书口题字的相对位置也与“本衙藏板”本同,显系一本覆刻另一本,然“本衙藏板”本与《绣像红楼梦全传》何者为底本,尚不敢必。

道光十二年壬辰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刊行,光绪七年辛巳张新之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刊行,光绪十年甲申王希廉、姚燮合评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刊行,稍后,王希廉、姚燮、张新之合评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刊行,这几种本子的评语内容远较东观阁评本丰富,也更符合大众的阅读需要,因此,大致从光绪以后,东观阁系列的刻本逐渐淡出市场。但是,东观阁本作为《红楼梦》最早的刻本之一和最早带批注的刻本,它本身拥有相当多的直接读者,其众多的重刻本和覆刻本,几乎占领了《红楼梦》的市场,成为嘉庆至咸同间最常见的印本,对《红楼梦》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由于东观阁主人第一次给《红楼梦》加上了批注,不仅赢得了读者,还对以后的王希廉和姚燮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姚燮的评语中,更是大量地引用东观阁批注^⑨,这些都奠定了东观阁本在红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杜春耕、王清原、李国庆、殷梦霞诸君惠借资料,特此致谢。

注:

①⑨《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转载。

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在甲、乙两种本子之外,还有程丙本甚至程丁本,因其与本文关系不大,姑置不论。

③《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3页。

④“程高刻本《红楼梦》之刊行及流传情形”,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

集》第4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⑤《东方学》第53辑,1977年1月。

⑥参见拙稿《〈红楼梦〉东观阁本小议》,《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转载。

⑦《红楼梦书录》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⑧杜春耕先生所藏有题为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文禽堂版者,但缺前四回。笔者细核原书,实为同治元年宝文堂覆东观阁十六年本。

⑩《红楼梦书录》,第38页。

⑪⑬《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0页,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1年。

⑫宝文堂本系据东观阁嘉庆十六年刻本覆刻的证据,除字体风格和版式等全同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外,还沿袭了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的一些文字错误,如前面提到的第六回第三页A第九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教尔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宝文堂本“做官”二字亦误作“教尔”。魏绍昌先生谓宝文堂本乃据东观阁初刻本翻印,误。魏说见《红楼梦版本小考》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⑭曹立波:《〈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第30—31页,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5月。

⑮查东观阁嘉庆十六年本第九回至第十四回书口并无“东观阁”字样,善因楼本为何有“东观阁”字样,因未见原书,不敢妄言。

⑯《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9页。

⑰《红学史稿》,第9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⑱《红楼梦版本小考》,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⑲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第5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

⑳《程刻本红楼梦新考》,第1页,台湾国立编译馆1982年。

㉑参见一粟先生《红楼梦书录》,4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王三庆先生《红楼梦版本研究》,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1年,第629页;曹立波女士《〈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第37—38页“东观阁——三让堂系统评本见知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5月。

㉒一粟先生说见《红楼梦书录》,第39页。王三庆先生说见《红楼梦版本研究》。

②3韩说见《红学史稿》第93页;魏说见《红楼梦版本小考》第59页。

②4《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8页。

②5《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0—621页。

②6《红楼梦版本小考》第59页,1982年。

②7《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鸟居久靖先生花甲纪念论集:中国之言语与文学》,1972年。

②8王三庆先生:《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3页。伊藤漱平先生在《二十世纪红学展望——一个外国学者论述〈红楼梦〉的翻译问题》一文中亦同此说,见《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

②9关于这一点,参见杜春耕先生“《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3月;曹立波博士《〈红楼梦〉东观阁研究》下编“评点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02年5月。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上接第105页) 刘仁初所编《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的续书来看待。是集刻于至正四年(1344),国内早已失传,举世也仅存此一种,堪与静嘉堂文库所藏元刻本《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并称为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元代科举文献的双璧。而上录内阁文库藏朝鲜刻本《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古赋八卷对策八卷》,则除了有助于考证刘仁初所编《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这一巨著的版本源流和传播情况以外,还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注:

①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②参见拙作:《论元代科举与辞赋》,《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